

什麼是幸福的童年

蘇聯報刊關於家庭教育的論文選集

中國青年出版社

什麼是幸福的童年

——蘇聯報刊關於家庭教育的論文選集——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主要是闡述父母應如何在家庭生活和日常勞動中，培養自己的子女具有熱愛集體、熱愛勞動的共產主義道德品質和優良的生活習慣等問題。文內批判了有些父母認為滿足孩子的物質享受就是幸福的錯誤認識，以及溺愛孩子、以惡劣的方式對待孩子的錯誤態度。

書號 650 文教 66

什麼是幸福的童年

編輯者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出版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印刷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2 字數 43,000

定價 1,800 元

一九五五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50,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6號

目次

誰的罪過？.....	阿爾卡吉·羅扎諾夫	一
什麼是幸福的童年？.....	維恩茨克維奇——薩特契科娃	二
要善於安排自己的幸福.....	格·普羅左羅夫	三
什麼是兒女的幸福？.....	阿·傑米娜	三
母親，精神上的親愛的.....	李赫切娃	三
培養孩子對勞動的熱愛.....	依·別切爾尼柯娃	四
「我要」——「不能」——「應當」.....	列夫·卡西爾	五

誰的罪過？

阿爾卡吉·羅扎諾夫

……尤利·斯界潘捷夫——這個寬額的、帶着一雙靈活的黑眼睛的十六歲的小伙子，受到了法庭的審判。他好奇地環顧着法庭上聚集的人們，而當他和別人責難的目光相遇時，就低低地垂下了頭。每一個出庭聽審的人都禁不住問自己：一個在勞動家庭裏教育出來的蘇聯小學生，怎麼會犯罪呢？為什麼他今天不是站在教室黑板旁邊回答數學或地理問題，却是站在法庭上，由於拿刀向同學們勒索金錢而受審呢？是的，毫無疑問，這是尤利的罪過，但是，難道這只是他一個人的罪過麼？

沒有一個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而在我們蘇維埃國家裏所做的一切，都是爲了使父母們能實現自己的這個美好的願望。共產黨和蘇聯政府不倦地關懷勞動羣衆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千百萬個和諧幸福的蘇維埃家庭過着歡樂的生活，而在這些家庭裏教養着和成長着幸福的蘇聯孩子。

但是孩子的幸福並不僅僅是由生活所提供的這些可能性來決定的，而且也是由那些生育孩子、教養孩子的人對幸福的正確理解來決定的。在這裏，正像生活所顯示的一樣，蘊藏着教育中很多失敗的根源。

尤利的父親華西里·格拉西莫維奇，是首都地下鐵道某處的電氣總機師。他參加過衛國

戰爭，受過政府的獎勵，又是先進生產者。尤利的母親安東尼娜·安德烈耶夫娜也在運輸部門，在雅羅斯拉夫州鐵路管理局工作。她是一個守紀律的模範工作者。斯界潘捷夫一家的物質生活很富裕，住的房間也很講究、舒適。

尤利和他十二歲的妹妹奧麗亞都是很能幹的孩子。學校的老師們異口同聲地說，這兩個孩子會學得很好。可是，奧麗亞的成績却都是三分，而尤利則更壞，學習成績不及格，不守紀律，並且最後還被送到法院去受審判了。

當初，當他們在初年級學習的時候，他們都是優等生，學校的成績單和鑑定證明他們勤學端品，成績優良，有禮貌，守規矩，有組織性。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這些孩子的行為為什麼變得這麼快呢？

「這一切都是家庭造成的，」教師們這樣告訴我：「你去和他們的父母談一談，一切就都清楚了。」

……我們坐在一間收拾得很乾淨的屋子裏，我聽着安東尼娜激動地講出了這些話。

「難道我們在什麼地方還拒絕過尤利嗎？」安東尼娜說道：「不管有時怎麼困難，尤利要買什麼東西我們總是照買的，又是新衣，又是皮鞋，皮大衣……」

「不久以前才給他買了秋天穿的新大衣，」華西里·格拉西莫維奇接着說。

「尤利真是一個忘恩負義的孩子，你聽我說，」母親悲傷地說：「我們對他什麼都做到了，什麼都給了他。而我們還有一個小女孩呢，誰都知道，女孩子需要外衣，短上衣，鞋子……」

從這個坦白的談話中，可以一下子看出，原來父母對孩子的關懷，僅僅只表現在片面的對孩子物質生活的體貼入微上，父母只關心孩子生活的「富裕」，後來，才明白了，父母對孩子物質生活的關心都超過了其他一切。

「請告訴我，你們是怎樣教育尤利的？你們是怎樣注意他的學業和操作的？怎樣指導他的行動的？」

「這已經是我分內的事了，」華西里·格拉西莫維奇說：「我甚至不知道，我應該怎樣來教育他。我連一分鐘空時間也沒有，一從辦公室回家，就要爲尤利的事情東跑西走。總有這麼多好事等着你：一星期把我請到學校去一次——這算是最小的事情了，要不是因爲得了兩分，就是因爲調皮搗蛋。在院子裏誰都叫他『頭目』，他第一個開始踢足球，把院子的玻璃不知打碎了多少。誰來賠呢？又是我。我對他說：『尤利，你先用自己的勞動去掙錢，然後才去打玻璃』……。我有時打他，不打真沒有辦法。你不要多心，我並沒有狠狠地打他。我打他，只是爲了維持我做父親的威信。但是終究還是把他沒有辦法，對他說來，跑上街去比在爸爸媽媽身邊好得多。如果你向他講道理：『尤利，你簡直太不像話了，不能夠這樣，』但他却往窗外瞧，恨不得馬上就跑到街上去。沒有辦法了，只好把他網在牀背上，但能把他網得住多久呢，一點鐘，兩點鐘……，你一給他解開繩子，他又跑掉了。」

「這種教育工作真把我折磨透了。而他的媽呢，幾星期幾星期都不在家，出差去了，只得由我來對付他！於是我跟尤利訂好條件：只要你學習好，不叫人說你，我就決不會虧待你。沒有一個星期天我沒有拿錢給他看電影。他也常常上馬戲團和動物園去……唉，還有什

麼不夠的呢？有一次他跟我耍一雙滑冰鞋。好吧，我說，只要你配穿我就給買。這樣，兩三個禮拜他都很好地學習，沒有受到批評。噫，原來只要你想變好，終究還是可以變好的呀。我想，好吧，這樣的事情應該鼓勵，於是就給他買了冰鞋。哪知他又耍起流氓來了，簡直滿不在乎……。有一回，他跟我耍了錢買幻燈，後來就在牆上放映起幻燈來，把一個桌子全弄髒了。小孩子一羣羣地跑到我家來，而尤利也拿着幻燈到各個學校亂跑……。又是一件倒霉的事情！我對他說：『尤利，幹嗎老是不做正事呢？好好坐着，讀讀書，不更好些嗎？幻燈只能當做一時的玩意兒。』果然，不久他就玩膩了，把幻燈丟開了。也不知道是把它賣了呢，或是扔到垃圾堆去了……。他無論要求什麼我從沒有拒絕過，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向別的孩子要錢看電影，而且還用刀子。如果他來向我耍，我自己就給他了。唉，還有什麼可說的呢！我爲他費了多少心血，我想盡了方法來教育他，我真不知道還有誰像這樣爲孩子操心呢！」

華西里還談了很久，而這時尤利正坐在不遠的地方，專心地看着自己的皮鞋頭。看來，這一番話他也不是初次聽了，他好像很無聊似的，他的思想早已飛得遠遠的了。而且也很清楚，尤利的父母並沒有懂得自己的錯誤，他們真正相信，爲了孩子的「幸福」他們已經做了一切，並且實實在在盡到了自己作爲父母的職責。

當然，父母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的。但是他們自己是怎樣理解幸福的呢？給吃，給穿，給巧克力糖來慣養孩子，而長大些以後，就給錢看電影。只要沒有得兩分，就「獎」給他看馬戲的票。爲了要他好好學習，就答應給他買冰鞋。

尤利有了「一切」！但是一個最需要最寶貴的東西他却沒有，這就是友愛的家庭。須知，

家庭——這並不單單是一些成年人和孩子在一塊吃飯，在一個房子裏居住。家庭——這是一些親近的人們的小集體，這些人因為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想法和感情而團結一致。他們使彼此的心靈更加充實，使彼此的生活更加美滿。

而斯界潘捷夫一家是不是這樣和睦的家庭呢？

當尤利還是個小孩的時候，也許父母給他的那一點照顧是足夠的。但是當他長大些以後，他產生了新的興趣，新的要求和許多問題。父母並沒有對他的這許多問題作解答，有時是因為父母顧不到，有時只是因為父母對這些問題感到厭煩。實際上一家人都各自過着各自的生活。大家沒有像一家人一樣坐在桌子旁邊，親密的在一起，談些有趣的事情，交談一下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父母沒有聽聽孩子們的意見，沒有懇切地和孩子們談談，沒有和他們一塊說笑和玩耍。

父母沒有努力想辦法把孩子充沛的精力引導到合理的方面去，而尤利的父親還是一個電氣機械師呢！其實，他可以吸引自己的兒子來搞電氣技術的工作，這是多麼有趣的事情啊！這可以滿足兒子的好奇心，可以充分地發揮他的精力，滿足他對誘人的事情的渴求。而尤利的父親呢，他總是把孩子趕開，當孩子惹得他厭煩時，就乾脆用錢把孩子「打發」走，讓孩子去看電影，給他完全的行動自由。而孩子就照着自己的喜好來過這些自由時間了，有時他按照自己過去偶然的經驗來打發這些時間，或者在他們一羣中的另一些孩子的唆使下，去幹各種事情。

父親用工作繁忙來替自己辯護，但是在千百萬個蘇維埃家庭裏，所有的父母們並不比他

間一些，然而他們却仍然抽出時間（其實並不需要太多的時間）來積極地參加教育自己孩子的工作，和學校保持經常聯系。

而安東尼娜·安德烈耶夫娜呢，因為她有時整月不在家，隨列車小組一塊到海參崴去，所以就用這個來做藉口。當然，離家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她同孩子的接觸，影響了她對孩子行爲的監督。但是，如果母親對孩子更關心一些，那末就是在這樣比較短的離家的時期裏，也不會引起如此嚴重的惡果來的。比方說，母親可以在路上給孩子寄幾封充滿母愛的懇切的信，給孩子掛個長途電話（好在住宅裏有電話），留點什麼事情給孩子做做，讓孩子經常感到他和媽媽之間有一種看不見的聯系。而且，應該問一句，難道所有這些離家的差事都是非做不可的嗎？須知學校不只一次通知過安東尼娜·安德烈耶夫娜，告訴她需要加強對尤利的監督，加強對他的生活和行爲的監督。但是母親是怎樣回答的呢？她說，出差可以多掙很多錢，又說她沒有工夫來教育尤利，說什麼教育孩子是學校的事。當然，母親努力掙錢並不是爲了自己，而又是爲了孩子，爲了孩子的「幸福」，但是，難道不正是由於片面追求「利益」，追求金錢，才遮蔽了母親的眼睛，使她看不清什麼是家庭和孩子的真正幸福嗎？

父母們沒有覺察到，他們和孩子的相互關係變得那麼貧乏和冷酷了。尤利知道，父母的任務是給他吃，給他穿，給他錢用。至於其他的興趣，他就寧可到街上去尋求滿足了。而父母呢，在孩子沒有照例地弄出亂子以前，他們對孩子的這些行爲是完全滿意的。一旦孩子弄出了亂子，父親就打他一頓，把他捆在牀上。父親這樣做只能使孩子怨恨他，只會使孩子離得他更遠，這難道還不清楚嗎？此外，父親老是教訓他：「不准做這個，不准幹那個。」如果

回憶一下高爾基說的關於這方面的話是有好處的。高爾基說：「用呆板的語言向孩子說教，這就等於引起孩子的煩悶，並使他們在內心對這種說教的主題感到厭惡。」

父親和兒子的談話常常歸結到錢的問題上去。只要回憶一下尤利因玩足球而打碎了鄰居的玻璃之後，父親和他的一次談話就足夠了。難道父親叫尤利注意了牠的行爲是不道德的嗎？難道他竭力使兒子反省了嗎？父親的想法是另一樣的：「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吧，只是別叫我出錢！」父親甚至教兒子爲了賺錢而學習；只要不得兩分，每個星期天都可以得到三個盧布去看電影。錢對於尤利已經成爲「最高的幸福」了，爲了得到錢，他可以不擇手段，這不是使人驚奇的嗎？

但這對於尤利的父母說來並沒有什麼新奇的。所有這一切他們在尤利唸書的第「三一」、「三一三」和「三〇五」學校裏已不知聽過多少回了。在奧麗亞唸書的「六一二」學校裏過去和現在也都談論過和這同樣的事情。但是，可惜得很，父母並沒有從這些警告中作出任何結論來。

去年五月父母被請到公安局去了：學校的一個女職員從尤利那裏奪下來一把他在玩着的芬蘭製的刀子。誰也不知道這把刀子是從哪裏拿來的。公安局的人當着父親的面對尤利說，芬蘭刀不是玩具，而是武器，私藏這種武器已經是一種犯法的行爲。鑑於尤利年紀輕，又沒有作過有害的事，公安局決定不提出刑事訴訟。華西里·格拉西莫維奇那時在文件上簽了名，保證加強對兒子的監督，並答應採取必要的方法來教育兒子。他採取了什麼樣的方法呢？又把兒子痛打一頓……至於尤利和什麼樣的同學在一起玩，都做些什麼，是否需要到這些人的

家裏去看看等等，這些事情父親是沒有時間來關心的了，正確點說是沒有這種願望的。

當然學校對於所發生的這件事也是有過錯的。教師們本應該告訴尤利的父母正確教育尤利的方法，共同訂出教育尤利的計劃，並堅持不懈地去做。而學校却只局限於把尤利的父母多次（因此也失去力量）請到學校來，向他們抱怨孩子怎樣不好。

本來應該更積極地吸引尤利去做一些課外工作。這個精力充沛的小伙子如果能在小組中工作，參加體育活動，是能滿足他那沸騰的渴望活動的心願的。兩年前尤利對幻燈很感興趣，並自願答應鄰校的要求為他們放映幻燈片。但是不論是學校或是家庭都沒有把這個男孩子的健康的興趣鞏固下來，讓它發展下去。

尤利雙親工作地方的黨和職工會組織是知道斯界潘提夫家中這些不愉快的事情的，因為他們收到過尤利唸書的那個學校送來的通知。去年四月二十四日學校送來了一封信，信中說道：「學校懇求關心這個孩子的教育問題，以免他墮入犯罪的歧途。」這個警告是夠肯定的了！可是，地下鐵道某處黨委書記謝維林同志和職工會地方委員會主席謝明同志並沒有根據這封信採取任何措施，他們大概是這樣考慮的：斯界潘提夫是一個優秀的生產者，對他還要求些什麼呢？

誠然，尤利本人是能夠而且也應該對自己的過錯負責的。蘇聯的法律公正地認為，一個十六歲的青年能夠獨立地判斷自己的行為，也能夠為自己的犯法行為負責。正因為如此，所以尤利也就出庭受審了。但是，尤利在很大程度上終究是不正確教育的犧牲者。關於尤利的妹妹奧麗亞的情形也已發出警告了。這個女孩子的學習一年壞似一年，家庭作業常常沒有完

成，常常遲到，愛撒謊，許多時間是在她父母所不知道的女朋友圈子裏度過的。她的父母幾乎就沒到學校去過。所有這一切都是不好的徵兆。

……尤利·斯界潘捷夫的這個案件正是父母忘記了自己職責而引起惡果的一個鮮明的例子。在以狹隘的物質享受為主的家庭裏，在父母忘却了孩子的精神世界、忘却了孩子的道德教育的家庭裏，孩子們是不會成為真正幸福的人的。在這樣的家庭裏，孩子們不但在肉體上，而且主要在精神上得不到父母的照管，這就能夠導致並且已經導致了悲慘的後果。

當然，這種無人照管的現象常常會因學校、好的集體和我們蘇維埃社會整個生活制度的良好的影響而得到克服。雖然常有這樣的情況，但總不全然如此。所以應該非常尖銳地提出家庭對教育孩子的責任的問題來。

莫斯科市古比雪夫區的人民法庭審訊了尤利·斯界潘捷夫的案件。在法庭上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來，甚至對尤利的刑事訴訟也沒使他的養育者受到教育。

尤利的父親沒有出庭。他只是讓他的妻子轉告，他已「倦於管兒子的事了」，他「已討厭兒子」，他說，「法庭願意把他兒子怎樣處置就怎樣處置好了」。華·格·斯界潘捷夫自己把尤利「教育」到犯罪的地步，可是卻沒有勇氣去聽審判，也沒有勇氣對發生的事情和兒子分担一部分責任。

尤利唸書的學校雖然依法必須派代表出庭，可是他們也不願出庭。這樣一來，學校「擺脫了」這個不守紀律的學生，也就不再關心他的命運了。

尤利的母親在法庭上的發言中竭力替自己和丈夫辯護，她企圖證明，父母正確地教養過

兒子，關心過他，但是，尤利「一點也不聽話」，因此，他們對兒子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了。

鑑於尤利的父母無能採取堅決和正確的辦法來改正自己的錯誤和改造尤利，法院決定判處尤利勞動改造兩年——也就是到他的成年爲止。

這就是家庭和學校沒有正確教育尤利的慘痛的結果，這就是教育者對於自己最重要的社會職責採取不可容忍的漠不關心和毫不負責的態度惡果。

但願尤利的這個可悲的事件和他父母的嚴重錯誤能對其他的父母和教師們敲起警鐘。我們的孩子們應該有真正的幸福——這種幸福是有理智的、積極的、能給周圍的人們，也能給孩子本身帶來歡樂，這種幸福能把孩子們教育成真正的蘇維埃人。

胡平、韶康譯，陳大維校

（譯自一九五四年第二期蘇聯「家庭與學校」雜誌）

什麼是幸福的童年？

維恩茨克維奇——薩特契科娃

從自己屋子的窗口望去，我看見正在建築中的一座寬敞明亮而有寬闊走廊的房子，走廊已裝上了玻璃。人們正在整理房前的小花園。不久，這座房子裏就會充滿孩子們的嘻笑聲。這裏就是未來的幼兒園。

在我國的城市和鄉村裏，用作託兒所、幼兒園、小學校、兒童休養所以及少先宮的新式而漂亮的建築物，在一天一天地增加着。

我國兒童有着一切可能幸福地生活和學習，愉快地休息和發展他們自己的天才與能力。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千百萬勞動人民的孩子的痛苦生活，與我國兒童的幸福童年相比，真有天淵之別。

每當看到兒子正在設計那難以令人理解的模型時，當聽到花園玩耍着的孩子們喋喋不休的說笑聲時，當看到一羣孩子愉快地從學校裏跑出來時，當看到整隊的有說有唱的少先隊員到郊外去野營時，我們這些成年人常常會想起「幸福的童年」這幾個字來。

多麼幸福的童年啊！……但是，我們作父母的對這幾個字的含意經常都能正確地理解嗎？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因為它關係着我們對待孩子的態度，主要的是它關係着孩子的將來和他們整個的一生。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想開始一個廣泛而認真的討論。

……一羣孩子在院子裏打籃球。有位婦人站在窗口叫喚了好久了。「阿里克！阿里克！……」

個子高大、體格長得很勻稱的阿里克不耐煩地迴避着媽媽，仍繼續玩着。遊戲結束了，他才懶洋洋地走到敞開着的窗子前。在他剛才還是美麗、興奮的臉上由於顯然的不滿意而變得難看了。

他粗暴地問道：「喂，你幹嗎？」

「請你去買點麵包！」

「你還想幹什麼！我馬上就要上學去。你自己去買吧！」

「阿里克，你知道我不能……」

但是，阿里克已經從窗子前跑掉了。

過了幾分鐘，阿里克的母親從大門裏走出來。手裏抱着小孩，肘上掛着買東西的袋子……

我在學校裏認識了阿里克的母親。她承認教師們在抱怨阿里克懶惰、粗暴和逃學。

她說：「我爲他很苦惱。他在家裏也是那樣……難道我要把自己的一切都給兒子嗎！他的一切都滿足了。我們自己節省，什麼都給他；父親給他買了自行車、照相機、冰鞋。然而他無動於衷，一點也沒有感到父母的關懷。我真不明白，他怎麼會這樣的。」

在其他家庭裏，我們也同樣遇到過這樣的父母，他們對子女這種類似「無動於衷」的行

爲表示驚異。六年級的學生鮑利斯單獨有一間屋子。母親給他擦皮鞋，料理衣服，做他預先指定的菜飯。但是鮑利斯不願讀書，又粗暴又馬虎，經常把弟弟弄哭了。

家長委員會的委員問鮑利斯的母親：「你是否從小就使鮑利斯養成勞動的習慣？」

母親不同意地說：「爲什麼要這樣呢？我們並非生活在要強迫孩子去工作的時代。我們對他們沒有別的要求，只要他們好好學習就行。但不幸的是，鮑利斯不好好學習。我真不明白他想幹什麼。」

還有一種「難以對付」的情況。愛爾拉從小就聽到些雜言雜語——「美麗的小女孩！」「美人兒！」「漂亮的嬰兒！」，母親最喜愛打扮自己的好女兒。她們給她吃糖果，滿足她的一切嗜好和慾望。吃夠了糖果的愛爾拉就不想吃飯。媽媽手裏拿着盤子，伸着匙，白跟在她後面追着跑。最後，愛爾拉不好意思不答應喝五匙湯，但是父親得跳一個「印度舞」。

「她還小呢，能要她幹什麼呢？」父母對那些說他們過分溺愛女兒的人這樣來辯護。

愛爾拉已經十五歲了，仍是一頭美麗的金黃色的頭髮，天真純樸的藍眼睛，調皮地噘着嘴。她父親的工資有一半都花在愛爾拉的裝飾上。但愛爾拉是「不成器的人」；她在七年級留了級，於是不得不把她送到另一個學校去讀書。因爲據她說，那個學校裏的教師們排斥她。但情況並沒有轉好。這是父母的罪過。後來她的父母自己也看到，愛爾拉是個個人主義者，冷酷無情的、空虛而且容易激動的人。她所感興趣的只是男孩子和服裝，後來也不在校裏好好的學習。父母很驚駭。開始勸說她，教導她，甚至懲罰她，但是都沒有用。

愛爾拉考試不及格。母親傷心地流着淚，父親威嚇說要把女兒趕出家去，然而愛爾拉